

新书速递

《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



这本书以严谨细致的笔调,深度还原了国学大师罗振玉的一生。全书围绕三条线展开:一是历史线,以个人经历展现晚清至民国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揭示深受传统儒家观念熏陶的罗振玉在时代剧变中如何立身谋国,按照自己的人设走完一生;二是学问线,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是金石学、甲骨学、敦煌学、农学、校勘学等领域的卓尔大家,本书全面展示罗氏的学术发展历程和成就;三是交际线,罗振玉一生结交的重要人物极多,皇帝如溥仪,官员如张之洞、张謇,学者如王国维、俞樾、刘鹜、梁启超、内藤湖南等,本书勾勒史料,将错综复杂的人物交往穿插在学问探究之中。全书从资料搜集至成书出版耗时近30年,是当今罗振玉传记的权威之作。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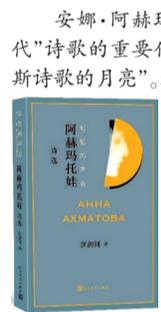
《把自己作为方法》



两代学人项飙和吴琦,跨越北京、天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人文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上海文艺出版社)

《记忆的声音——阿赫玛托娃诗选》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白银时代”诗歌的重要代表,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这本书精选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一百五十余首,包括早期具有“室内抒情”特点的、优美细腻的诗作,也有后期“抒情的历史主义”风格的《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等重要诗篇。本书译者为诗人、评论家、翻译家汪剑钊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生哪有那么多赢家》



这本书是自媒体人气写手诺澄多篇爆款文章的集结。诺澄身上带着“金融”“海归”“职场女性”等标签,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职场女性与“人生赢家”。作者在书中从职场、亲子、爱情与自我四个方面,讲述了自己真实的经历与感悟,展示了所谓“人生赢家”背后的生活情状与真实面貌。在作者看来,所谓“赢家”,不过是不要轻易认输、不轻易向生活低头,每当遭遇挫折时,依然保持温暖的笑容。(复旦大学出版社)

滋兰树蕙,迦陵妙音

◆ 秋涵



“你站在那里,就是一首诗,劫波历尽,一片冰心。你一开口,宛如飞天展翅,古今悲喜,荡气回肠。七十年滋兰树蕙,融贯中西;集陀庵之诗话而别开生面,启桃李之芳园而香远益清。你是擎灯使者,迦陵妙音。”这是2014年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组委会致古诗词大师叶嘉莹先生的颁奖词。

主持人白岩松说:叶先生做的不仅仅是文化传承的事,她是这个民族缝隙处的胶水,隔阂处的桥梁……看着叶先生和她做的事,你就不会慌。”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自言“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数十年来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研究和推广工作,桃李满门,著作等身。她曾在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世界知名高校任教讲学,享誉海内外。



《迦陵谈诗》是叶嘉莹钻研中国古典诗歌多年的成果结晶,共收录十二篇文章。这些文章既有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宏观梳理,又有对具体诗人诗歌的内部研读。叶先生谈诗,并不着意将诗歌内容与诗人经历一一对应,也并不拘泥于刻板的字面解说,而是依托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诗心,深入探索诗人的精神世界,寻找诗歌中蕴含的能激起人类永恒共鸣的情感点。这本书文风典雅考究,兼采古典文言、现代白话与西式表达之长。

《迦陵谈诗二集》续接《迦陵谈诗》,侧重古典诗歌评论。兼有中西双重学养的叶嘉莹将中国传统诗歌品鉴美学与西方近代文学理论结合,既肯定了西方文论的融入可以增强古诗评论的客观性与精密性,又指出古诗评论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与古诗创作特质。书中还有对恩师顾颉刚的学术总结与深切怀念,并说明了《迦陵谈诗》与《迦陵谈诗二集》两本著作的创作情况,论理谨密,抒情真挚,语言典雅考究。

《清词选讲》是叶嘉莹在新加坡国立中文大学教授清代词的讲稿,由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相比唐宋词,人们对于清词知之有限。叶嘉莹在多年前就已认识到清词的重要性,以十位词人、十余首词作连缀成一部贯穿着忧患意识与士人修养的清词简史,对词的美感特质和对清代词人隐藏在词作后的心态,以及清词创作的外部环境,都给予了关注。

《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讲录》是叶嘉莹面向普通读者的古诗讲座讲稿合集,共有《概论》《陶渊明诗浅讲》《杜甫诗浅讲》《李商隐诗浅讲》四讲。陶渊明、杜甫、李商隐这三位诗人,遭际不同,个性有别,诗风各异。本书将三人并举,分析了他们各自在诗歌中对于形象和手法的使用。内省型的陶渊明在诗中使用概念化的形象,外观型的杜甫在诗中使用现实中实有的形象而有所突破,李商隐则以想象中的非理性形象映照幽微的内心世界。这种差异不仅折射出了诗人个体的生命与心灵,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轨迹。这本书平实亲切,通俗易懂,是一本轻松的大众普及读物。

叶嘉莹先生带领现代读者走进古代伟大诗人关怀民生万物的永恒灵魂,感受古诗“感动”“发生”的精神力量,生生不息。她视文学与历史为有生命之物,讲解作品细致入微,注重审美体验,并时时将传统文化背景知识渗透其中。

《迦陵谈诗二集》续接《迦陵谈诗》,侧重古典诗歌评论。兼有中西双重学养的叶嘉莹将中国传统诗歌品鉴美学与西方近代文学理论结合,既肯定了西方文论的融入可以增强古诗评论的客观性与精密性,又指出古诗评论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与古诗创作特质。书中还有对恩师顾颉刚的学术总结与深切怀念,并说明了《迦陵谈诗》与《迦陵谈诗二集》两本著作的创作情况,论理谨密,抒情真挚,语言典雅考究。

《清词选讲》是叶嘉莹在新加坡国立中文大学教授清代词的讲稿,由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相比唐宋词,人们对于清词知之有限。叶嘉莹在多年前就已认识到清词的重要性,以十位词人、十余首词作连缀成一部贯穿着忧患意识与士人修养的清词简史,对词的美感特质和对清代词人隐藏在词作后的心态,以及清词创作的外部环境,都给予了关注。

《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

《迦陵谈诗二集》续接《迦陵谈诗》,侧重古典诗歌评论。兼有中西双重学养的叶嘉莹将中国传统诗歌品鉴美学与西方近代文学理论结合,既肯定了西方文论的融入可以增强古诗评论的客观性与精密性,又指出古诗评论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与古诗创作特质。书中还有对恩师顾颉刚的学术总结与深切怀念,并说明了《迦陵谈诗》与《迦陵谈诗二集》两本著作的创作情况,论理谨密,抒情真挚,语言典雅考究。

《清词选讲》是叶嘉莹在新加坡国立中文大学教授清代词的讲稿,由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相比唐宋词,人们对于清词知之有限。叶嘉莹在多年前就已认识到清词的重要性,以十位词人、十余首词作连缀成一部贯穿着忧患意识与士人修养的清词简史,对词的美感特质和对清代词人隐藏在词作后的心态,以及清词创作的外部环境,都给予了关注。

《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

《迦陵谈诗二集》续接《迦陵谈诗》,侧重古典诗歌评论。兼有中西双重学养的叶嘉莹将中国传统诗歌品鉴美学与西方近代文学理论结合,既肯定了西方文论的融入可以增强古诗评论的客观性与精密性,又指出古诗评论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与古诗创作特质。书中还有对恩师顾颉刚的学术总结与深切怀念,并说明了《迦陵谈诗》与《迦陵谈诗二集》两本著作的创作情况,论理谨密,抒情真挚,语言典雅考究。

《清词选讲》是叶嘉莹在新加坡国立中文大学教授清代词的讲稿,由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相比唐宋词,人们对于清词知之有限。叶嘉莹在多年前就已认识到清词的重要性,以十位词人、十余首词作连缀成一部贯穿着忧患意识与士人修养的清词简史,对词的美感特质和对清代词人隐藏在词作后的心态,以及清词创作的外部环境,都给予了关注。

《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

从小说中发现问题

◆ 伊永文



1962年,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为同样著名的已故历史学家余嘉锡的《论学杂著》作序,说过“从小说中发现问题”,这对余嘉锡先生小说研究的学术特点总结得十分精辟,又揭示了小说在学术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从小说角度看,“小说”之称最早出自《庄子·外物篇》。自此以后,小说从未被儒林学士轻视过,如桓谭《新论》所论:小说家的从残小语,“有可观之辞”,即为一例。如撰写《资治通鉴》巨著的司马光等人,在著书过程中就是采取了“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的方式。也就是说,从小说寻历史,又以历史反证小说,这一方式早已流行学界,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就是其中的范例。如余嘉锡所认为:《水浒传》出于宋时话本,故其语言莫不有本。

应该说,《水浒寻宋》(虞云国著)与《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是有其这样的学术渊源的。《水浒寻宋》也可归入“从小说中发现问题”那一类,但不同的是,《水浒寻宋》要比《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寻”得更全面。我们看到那满身花绣的刺青,鬓角簪花的闲汉,纸马随之火葬,押字来自宫廷。尽管《水浒寻宋》也涉及了江河激战、金枪攻阵、破寨称雄等场面,而且时常让我们听到的是水泊酒店上空疾飞的响箭,但我们耳畔更多的还是吆喝叫卖与太平歌词交织而成的婉转悠扬之声……

正如《水浒传》研究家所认为的那样:打开《水浒传》,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中国北宋末年城乡各地的社会风情画,并非“农民起义”一说所能包容和概括得了的。

虞云国正是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关系社会风俗的研究,若客店,若打火,若炊饼,若豆腐,若酒望子,若菜园子,若铁扇子,若神算子……用《水浒传》中发现的具体而微的问题,一步步地在宋代历史中寻求“证实”。

这种研究,不是简单的罗列类比,而是将琐细的研究对象放置在大的制度框架下加以考察,将藏诸于干涩的典章之间的帷幕撩开,将大众比较陌

生的度牒、押字的意涵解读出来,将“叉手”加以宣扬,将“打火”加以深究……从而使这些涉及习俗的研究构成了《水浒传》问题的主要方面。

这不由让人想起小说戏曲史家叶德均,力主《水浒传》中的风习、事物、语言、习惯还保存着宋代人的本来面目的观点,并写成《〈水浒传〉和宋元风习》一文。在这一点上,《水浒寻宋》与叶德均的认识相通,即从小说中发现问题要从细节研究开始。记得恩格斯在论述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时由衷地赞叹过:我们甚至在《人间喜剧》细节方面,也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历史还要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传》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宋代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正是由于有了《水浒传》用写实手法逼真再现了宋代历史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貌,我们才从《水浒传》中找到以市民为主体的市民社会风情生动而鲜明的注脚。如宋代历史书籍中经常提到的“赶酒座儿”,书中第三回就有金翠莲自道: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

如果辅以宋话本《计押番金鳧产祸》《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就会几乎可以窥见到“赶酒座子”的实况,例如:只见外面一个妇人酒店来:油头粉面,白齿朱唇。锦帕齐眉,罗裙掩地。鬓边斜插些花朵,脸上微堆着笑容。

那个女人入着酒店,与宋四公道个万福,拍手唱一支曲儿。宋四公仔仔细细看时,有些面熟,道这妇女是酒店擦桌儿的。这样的描写虽是文学性的,但比之史书单介绍“赶酒座儿”要更传神。类似出自小说家之手的材料,可以称之为“文学性史料”,归于史学的库藏亦毫不逊色。它是一个完全可以独立的系统,是完全可以冠之于“小说历史学”的大名堂的。

但是,又如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中说的一段话,可以发人深省:“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虞云国正是鲁迅所希望的这样的“具史识者”,他将鲁迅的活化实际,因而我们才读到了《水浒寻宋》一书。

点燃幽微的浮光

读《丁景唐传》

◆ 简平

《丁景唐传:播种者的足迹》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值得细嚼的传记。传主丁景唐是位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宣传处处长、新闻出版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丰富而珍贵的历史信源。

传记详细记述了丁景唐为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辞海》《中国新文学大系》等重大出版工程所付出的功不可没的巨大努力,史料翔实,叙述生动。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丁景唐在了解上海鲁迅纪念馆工作时,发现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革命文艺期刊很难保存下来,许多刊物流传很少,有些已成海内孤本,他深感保存和抢救革命文艺资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向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建议广泛收集现代文学书刊,并亲自参与制定了长期规划,包括整理和影印革命文艺史料。正是在他的提议和倡导下,《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问世。甲种是有关现代文学历史的编选、整理、编目等专题的丛书;乙种是“五四”至解放前的革命文艺期刊的影印本,从1958年到1962年,先后影印出版了两批四十余种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革命文艺期刊。

丁景唐长期从事文学、出版领域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与文化名流非常熟悉,从传记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关于他与名家大师交往的鲜为人知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勾勒出出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一幕。比如,1980年11月2日,丁景唐在北京拜访茅盾时询问道,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主持编印他的遗著《海上述林》,是否曾约他一起开会相商。茅盾听后很认真地回答:时隔多年,一时记不清楚,要再回忆回忆。后来,茅盾反复回忆并查证有关材料,终于使模糊的往事清晰起来,最后在《茅盾回忆录》之《一九三五年纪事》中明确地写道:得知瞿秋白牺牲消息的半个月后,鲁迅曾约他一起商量编瞿秋白遗作的事,详细交换了编选范围、筹集资金、联系印刷厂等方面的意见,“最后决定,由鲁迅与杨之华商定遗作编选的范围,并由鲁迅负编选的全责。由郑振铎去联系印刷所,等有了着落,再由振铎出面设一次家宴,把捐款人请来,既作为老朋友聚会对秋白表示悼念,也就此正式议决编印秋白的遗作。”“八月六日,郑振铎在家中设便宴,到十二人,都是当年商务、开明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是秋白的老朋友,记得有陈望道、叶圣陶、胡愈之、章锡琛、徐调孚、傅东华等。大家回忆起瞿秋白当年的音容笑貌,没免凄然。”茅盾的回忆,充分说明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好友对瞿秋白的深切悼念,而《海上述林》的出版,则为瞿秋白树立了“诸夏怀霜”的丰碑。

这部传记的作者丁言昭是丁景唐的三女儿,她很小就跟着父亲,后来又帮着父亲做资料整理工作,还在父亲指导下进行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所以,传记里许多内容也是作者亲身经历,因而细节精彩,特别鲜活,诚如陈思和为此书所写《序》中说的那样,整个叙述画面呈现出斑斓多彩的景象,如关于王映霞、关露、梅娘等人人际关系的描写都是如此,不仅丰富了丁景唐晚年生活场景,也通过这一家人的血缘传承展示了更为深刻的文化传承。

1944年春,丁景唐赴杭州开展地下学生运动。那时,从西冷桥畔通往岳坟的路上,都被铁丝网封锁着,丁景唐穿过封锁去拜谒秋瑾墓,写下了《西子湖边》一诗。他在诗中慨叹眼前只剩剩幽微的浮光,但他相信蓝空闪亮着一颗星,那是落日后的长庚,也即启明星,表达了对美好明天必将到来的信心。他的一生的确通过踏踏实实的工作,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点燃起幽微的浮光,一路播撒下发扬光大的种子。